

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一類白瓷獸面雙環瓶

■ 鄒培姍

北宋復古風氣盛行，除了新鑄仿古青銅禮器外，瓷器也出現不少仿古青銅器的樣式，如汝窯、定窯，並延續至南宋官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一類白瓷獸面雙環瓶，形制特殊，仿漢代銅壺造形，過去在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時曾被視為定窯。不過從定窯出土與傳世作品，及北宋博古圖錄中繪製的青銅器樣式來看，可以發現院藏獸面雙環瓶與北宋時期流行的器樣又略有不同。本文透過器形分析與胎釉特徵的比對，重新檢視院藏白瓷獸面雙環瓶的年代與窯口問題，認為這類作品的產地應為景德鎮地區，時代可置於元代晚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白瓷獸面雙環瓶共有四件，根據民國十四年（1925）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文物時所出版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可知原皆藏於壽安宮，三件當時命名為「定窯獸面雙環瓶」（圖1、2、4），一件定名為「白磁雙環獸面瓶」。¹（圖3）其中兩件名為「定窯獸面雙環瓶」（見圖2、4）的作品，到了《故宮瓷器錄》，則分別改為「金宿州窯牙白獸耳環壺」（見圖2）與「宿州窯牙白獸耳環大瓶」。²（見圖4）院藏的四件白瓷獸面雙環瓶，形制特殊，傳世少見，以下介紹四件作品。



圖1 元 景德鎮 米黃釉獸面雙環瓶 高63.7，口徑14.9，底徑14.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2178



圖2 元 景德鎮 米黃釉獸面雙環瓶 高70.7，口徑10.7，底徑18.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4585

院藏四件獸面雙環瓶，形制相當，皆為盤口，細長頸，溜肩，鼓腹，下置高圈足，圈足外有兩道突起的弦紋，肩部兩側則飾有獸面銜環鋪首。其中一件（見圖2）口沿雖為直口，但依其器形比例來看，現存的口沿應有殘缺。且仔細觀察該件作品現存口沿處，發現有金屬釦黏著劑的痕跡，推測該件作品頸部以上原來應與院藏其他三件同樣為盤口，或因傷殘而欲加裝金屬釦，故磨去口沿部分並塗上黏著劑。³ 釉色包含米黃釉與青白釉兩種，米黃釉作品釉面皆帶有細紋開片（見圖1、2、4），青白釉則無。（見圖3）器內為淋釉，底足與足內則均無施釉，胎土粗鬆，為灰白色。器身可見細微旋胚痕跡，應為轆轤成形，圈足為另接，兩側獸面鋪首則為貼塑而成。依照鋪首的製作方式，可分為捏塑與模印兩種，如圖1、4兩側獸面銜環鋪首皆為捏塑而成，因此兩側鋪首形態略有差異，且做工十分精細。另外兩件（見圖2、3）兩側獸面鋪首則為模印而成，兩側鋪首形態一致，且與圖1、4的形態與製作手法明顯不同。



圖3 元 景德鎮 青白釉獸面雙環瓶 高70.5，口徑15.2，底徑1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14306



圖4 元 景德鎮 米黃釉獸面雙環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4584

其他傳世作品

除了國立故宮博物院，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北京故宮）、美國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及上海博物館，也收藏有類似造形風格的作品。

北京故宮舊藏之獸面雙環瓶，定名為明仿定窯〈白釉「雲麓」款鋪首耳瓶〉。（圖5）形制、尺寸皆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相近。肩部兩側獸面鋪首為模印而成，釉色白中泛黃，並帶有細紋開片，底足與足內均無施釉。口沿處鑲有銅釦，且腹部刻有「雲麓」二字。北京故宮方面認為，與「雲麓」有關的文字見於明成化十四年（1478）吉簡王（1456-1527）就藩長沙時所建造的「雲麓宮」，為道教二十三洞真虛福地，據此推測該件作品與「雲麓宮」有一定關係，可能為「雲麓宮」中陳設的供器。⁴不過，該件作品上的「雲麓」二字無法確定是燒成後即題刻，亦或是進入宮廷收藏後才被刻寫上去，因此時代上是否要晚至明代，或許還有待商榷。

波士頓美術館所藏之〈米黃釉獸面雙環瓶〉（圖6），釉色米黃並帶有細紋開片，底足與足內亦無施釉，胎體較粗。頸部以上已被截去，並鑲有銅釦，應與院藏〈米黃釉獸面雙環瓶〉（見圖2）的情形相同。肩部兩側獸面鋪首同樣為模印而成，從獸面鋪首的形態來看，則與院藏〈青白釉獸面雙環瓶〉（圖3）十分相似。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白釉洗口鋪首瓶〉（圖7），通高74.8公分，形制與上述傳世作品類似，底足與足內亦均無施釉，但尺寸稍大，且圈足底部開有一小孔洞。兩側獸面鋪首為模印而成，釉色白中泛青，釉面無開片，整體十分精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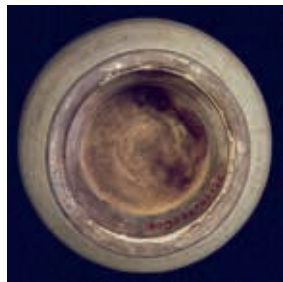


圖5 明 仿定窯白釉「雲麓」款鋪首耳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高70，口徑15.5，底徑16.5公分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定窯雅集——故宮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窯瓷器薈萃》，頁306。



圖6 米黃釉獸面雙環瓶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取自陸明華，〈韓國新安沉船米黃開片釉瓷產地再探——相關產品的延伸研究〉，頁103。



圖7 白釉洗口鋪首瓶 上海博物館藏 高74.8，口徑13.1，足徑17.1公分 取自陸明華，《明代官窯瓷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95。

造形的演變

這類獸面雙環瓶之祖型來自漢代（西元前206-220）的銅壺，從不少北宋年間（960-1127）出版的博古圖錄中，如《宣和博古圖》、《考古圖》，都可以找到相似的器形（圖8），而獸面銜環鋪首與弦紋的裝飾在漢代青銅器（圖9）中亦十分常見。不過，院藏的這類獸面雙環瓶在形制和裝飾手法上又與漢代銅壺略有不同，除了整體造形較為修長外，常見於漢代銅壺器身的弦紋裝飾也移至圈足，並以突起的方式表現，這樣的裝飾手法，與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所藏至正十一年（1351）〈青花雲龍紋雙耳瓶〉（圖10）圈足外突起的兩周弦紋十分相似。此外，兩側獸面鋪首亦趨向於

獅首形態，仔細觀察院藏〈米黃釉獸面雙環瓶〉（見圖2），還可以發現兩側獸面的額頭上刻了一個「王」字，似乎已完全脫離漢代青銅器上



圖9 漢 獸環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000456



圖10 元 至正11年銘 青花雲龍紋雙耳瓶 大英博物館藏 取自相藤茂樹、三上次男編集，《世界陶磁全集13・遼・金・元》，東京：小學館，1983，頁63。



圖8 宋 呂大臨 《考古圖》 卷4 獸環壺 清乾隆年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8720



圖11 北宋 定窯 獸耳瓦紋簋 底墨書「仲和珍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7793



圖12 西周中期 元年師旋簋 陝西省長安市張家坡西周窖藏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五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67。



圖13 宋 呂大臨《考古圖》卷3 散季敦 清乾隆年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8719

饕餮獸面紋的意涵。

觀看北宋汝窯、定窯，以及南宋官窯等仿古青銅器器類之造形，與三代或漢代青銅器皆較為相近。⁵以同樣為故宮博物院藏的北宋定窯〈獸耳瓦紋簋〉（圖11）為例，作為定窯仿古青銅器的樣式，其形制與紋飾佈局和西周銅簋（圖12）及《考古圖》（圖13）中的圖示皆十分相近。另一件院藏的北宋定窯〈白瓷鋪首龍耳方壺〉（圖14），則是仿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方壺造形，⁶其鋪首的形態與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河北省定州市靜志寺塔基出

土的一件定窯〈白釉五足熏爐〉（圖15）較為相似，而與院藏獸面雙環瓶差異甚大。且定窯產品的圈足底內通常都有施釉（見圖11），院藏獸面雙環瓶足內則均無釉。加上這類帶有獸面銜環鋪首的裝飾風格似乎流行於元代（1271-1368），如在江西省博物館藏的一件元代〈青白瓷鋪首長頸瓶〉（圖16），及元代青花瓷器（圖17）上皆可見。因此，筆者認為院藏獸面雙環瓶的時代上應要晚於北宋，並有可能晚至元代。另外，有學者曾提到，此類獸面雙環瓶之元素可能來自於定窯，這種器類的貼塑

鋪首與院藏的北宋定窯〈白瓷鋪首龍耳方壺〉（見圖 14）十分相似，因此北京故宮把「雲麓」款的獸面雙環瓶看作仿定窯器是正確的，此類作品在裝飾方面確實借鑒了定窯風格。⁷



圖14 北宋 定窯 白瓷鋪首龍耳方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7774



圖15 北宋 太平興國2年 白釉五足熏爐 河北省定州市靜志寺塔基出土 取自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定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頁119。



圖16 元 青白瓷鋪首長頸瓶 江西省博物館藏 取自周鑾書編，《中國歷代景德鎮瓷器·五代宋元卷》，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1998，頁230。



圖17 元 青花雲龍紋獸耳蓋罐 江西省高安市窖藏出土 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館藏 取自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4冊·江西》，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105。

姑且先不論這類白瓷獸面雙環瓶是否為刻意仿製定窯，但其年代與窯口有必要再重新檢視。

從出土材料來看，目前在北京元大都居住遺址（圖 18、19）、江西省宜春市元代窖藏（圖 20）、江西省樟樹市（圖 21）、江西省吉州窯茅庵嶺窯址（圖 22）、江西省景德鎮湖田窯址（圖 23），及明代江西省景德鎮珠山永樂官窯遺址（圖 24）都出土有類似造形的作品，皆為盤口，長頸，鼓腹，下置高圈足，兩側貼有獸面銜環鋪首，並且包含米黃開片釉與青白釉，與傳世獸面雙環瓶的情形相同。

綜合分析傳世獸面雙環瓶與出土品的形制，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 I 型，為元大都遺址、景德鎮湖田窯址出土頸部較粗短，腹部較寬，整體較為矮胖的類型。（見圖 18、23）第 II 型，則是如江西省宜春市元代窖藏、江西省樟樹市及吉州窯茅庵嶺窯址出土頸部較細，整體較為瘦長的類型。（見圖 20～22）江西省樟樹市（見圖 21）與吉州窯茅庵嶺窯址（見圖 22）出土獸面雙環瓶口沿處雖已殘破，然根據其器形比例推斷原應同樣為盤口。而院藏的四件獸面雙環瓶與其他博物館傳世作品之形制



圖18 元 獸面雙環瓶 北京元大都遺址出土 取自陸明華，〈韓國新安沉船米黃釉開片釉瓷產地再探——相關產品的延伸研究〉，頁102。



圖19 元 獸面雙環瓶 北京元大都遺址出土 高27.5，口徑8，底徑9.2公分 取自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元大都考古隊、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元大都考古隊，〈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遺址〉，頁9。



圖20 元 米黃釉剔花獸耳瓶 江西省宜春市窖藏出土 宜春市博物館藏 取自周浩、曹建文，〈新安沉船出水的米黃釉瓷器研究〉，頁205。



圖21 元 米黃釉開片刻花大瓶 江西省樟樹市出土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陸明華，〈韓國新安沉船米黃釉開片釉瓷產地再探——相關產品的延伸研究〉，頁101。



圖22 元 青白釉獸面雙環瓶 江西省吉州窯茅庵嶺窯址出土 殘高62，足徑14.4公分 取自張文江、何江、溫葵珍，〈吉州窯茅庵嶺窯址考古的主要收穫〉，《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9年12期，頁92。



代或可置於元代晚期。至於明代景德鎮永樂官窯遺址出土尺寸稍大，整體造形較為制式，線條趨於格式化，例如圈足外突起的兩周弦紋改以階梯狀表現的類型，則為第Ⅲ型。（見圖24）若以元大都遺址作為此類獸面雙環瓶的上限，那麼其出現的年代約於元代中期以後，⁸且整體造形至元代晚期有越加修長的趨勢，到了明代初期則漸趨格式化。

出土品之獸面鋪首的製作方式，同樣也包含了模印與捏塑兩種，如元大都遺址（見圖19）、景德鎮湖田窯址（見圖23）出土獸面雙環瓶，兩側鋪首皆為捏塑而成，與院藏的兩件〈米黃釉獸面雙環瓶〉（見圖1、4）相同。吉州窯茅庵嶺窯址出土獸面雙環瓶兩側鋪首雖已破損，然根據其線描圖（見圖22）來看，應亦為捏塑而成。而江西省宜春市元代窖藏（見圖20）與江西省樟樹市（見圖21）出土獸面雙環瓶兩側鋪首則皆屬於模印類型。筆者雖未能見到上述兩件鋪首的完整形態，但從側面觀察，

皆屬於第Ⅱ型。此外，湖北省武穴元至正十一年（1351）舒氏墓所徵集的一件〈卵白釉鋪首帶座瓶〉（圖25），尺寸雖小，通高僅24.6公分，且帶有底座，兩側獸面鋪首十分模糊，但形制與第Ⅱ型十分相近。因此，第Ⅱ型的時



圖23 元 米黃釉盤口瓶 江西省景德鎮湖田窯址出土 取自陸明華，〈韓國新安沉船米黃開片釉瓷產地再探——相關產品的延伸研究〉，頁103。



圖24 明 白釉盤口獸耳長頸瓶 江西省景德鎮珠山永樂官窯遺址出土 高78公分 取自首都博物館編，《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官窯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29。



圖25 卵白釉鋪首帶座瓶 湖北省武穴元至正11年舒氏墓徵集 取自周鑾書編，《中國歷代景德鎮瓷器·五代宋元卷》，頁266。

應與院藏的〈青白釉獸面雙環瓶〉（見圖3）、北京故宮（見圖5）及波士頓美術館（見圖6）藏品十分相近。而明代景德鎮永樂官窯遺址出土〈青白釉獸面雙環瓶〉（見圖24），兩側鋪首雖為捏塑而成，但整體較為突出，形態差異較大，且雙環較寬為實環，並非貼塑於器身，與其他出土及傳世作品貼塑於器身的細條狀雙環明顯不同。因此，若從形制的發展，加上鋪首形態的比較來看，院藏的四件獸面雙環瓶與其他博物館的傳世作品，包含北京故宮定名為明仿定窯〈白釉「雲麓」款鋪首耳瓶〉（見圖5），以及上海博物館所藏過去一直被視為是明代永樂景德鎮官窯甜白釉產品的〈白釉洗口鋪首瓶〉（見圖7），時代上應可置於元代晚期，不會晚至明初。⁹

產地來源

北宋中期以後，北方白瓷窯場遍布，或許受到文獻中提到宿州窯「器仿定色」的影響，¹⁰

這類質地較粗糙、過去曾被視為定窯的白瓷獸面雙環瓶，也一度被視為宿州窯的產品。但若以形制的發展來看，這類獸面雙環瓶應流行於元代中期以後並延續至明初。且除了北京元大都居住遺址外，其餘獸面雙環瓶皆出土於江西地區，因此較有可能為南方窯場所燒造。那麼，這類獸面雙環瓶的產地來源究竟為何呢？1975年，韓國元代新安海底沉船中打撈的一批米黃開片釉產品（圖26），胎釉特徵與院藏〈米黃釉獸面雙環瓶〉（見圖1、2、4）十分相似。最初，這類新安沉船類型的米黃開片釉產品被視為是福建漳州窯所燒，又因在明景泰七年（1456）至天順三年（1459）王佐增補的《新增格古要論》中曾提到所謂的吉州窯「碎器」，¹¹ 因此也曾被視為吉州窯的產品。¹² 不過，近年來隨著考古出土材料的更新，學界對這類米黃開片釉瓷器的產地來源似乎有了明確的共識。2019年，陸明華在他〈韓國新安沉船米黃開片釉瓷產地再探——相關產品的延伸研究〉一文中，利用景



圖26 元 白瓷雙耳香爐 新安沈船打撈 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中日新聞社編集，《新安海底引揚げ物》，東京：中日新聞社，1983，頁48。

德鎮湖田窯址新出土的材料進行比對，提出這類米黃開片釉的產品為江西景德鎮燒造的說法，並說明元代景德鎮地區窯場同時燒造了青白釉、卵白釉以及米黃開片釉的作品，文中亦提及此類風格的獸面雙環瓶為景德鎮窯場所燒造。¹³ 2020年7月，中國江西省景德鎮博物館也舉辦了「彝鼎留芳——宋元米黃釉瓷器特展」，當中展出許多米黃開片釉的作品，包含了景德鎮湖田窯、落馬橋、浙江省湖州市凡石橋遺址等幾個重要的考古出土標本。展覽亦顯示這類新安沉船類型的米黃開片釉產品的產地就在景德鎮地區，且窯場不止一處。¹⁴

然而，吉州窯茅庵嶺窯址出土類似造形的〈青白釉獸面雙環瓶〉（見圖22），令筆者感到好奇。雖依陸明華的說法，此件作品並非當地燒造，而是出自元代景德鎮窯場。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江西省宜春市元代窖藏（見圖20）與江西省樟樹市（見圖21）出土之獸面雙環瓶，除了釉面開片外，在盤口、頸部、腹部

與圈足的部分皆帶有剔花裝飾，其紋飾佈局與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元代吉州窯〈白地鐵繪唐草紋雙耳瓶〉（圖27）十分相似。且此類帶有剔花裝飾的米黃開片釉產品，亦可見於江西省樟樹市出土的一件〈米黃釉剔花月梅紋荷葉蓋罐〉（圖28），及江西省新建縣昌邑公社出土的一件〈米黃釉剔花月梅紋瓶〉。（圖29）而剔花工藝與月梅紋裝飾題材皆為吉州窯產品的特色（圖30），與江西昌邑公社出土〈米黃釉剔花月梅紋瓶〉（見圖29）相同的器形也可見於江西省永新窖藏出土的一件〈米黃釉開片洗口瓶〉（圖31），表示該窯場應同時生產有素面米黃開片釉及帶有剔花裝飾米黃開片釉的作品。此外，元代吉州窯茅庵嶺窯址出土有一件白地彩繪鼎式爐，其足部貼塑的獸形裝飾上以褐彩描寫了「王」字（圖32），與院藏〈米黃釉獸面雙環瓶〉（見圖2）的裝飾手法相似。因此，是否能完全剔除這類獸面雙環瓶為吉州窯生產的可能性？

不過，目前吉州窯窯址尚未發現米黃開片釉的產品，而景德鎮湖田窯址除了發現有米黃開片釉產品外，觀察窯址出土殘器上的貼塑裝飾，同樣也具有捏塑與模印（圖33）兩種方式，與傳世及出土獸面雙環瓶的情況相符。並且，在景德鎮浮梁縣衙周邊出土米黃釉標本（圖34）中出現的獸面形態及製作手法，¹⁵ 與院藏〈米黃釉獸面雙環瓶〉（見圖1）及元大都遺址（見圖19）、景德鎮湖田窯址（見圖23）出土獸面雙環瓶皆十分相似。由此看來，這類造形風格的白瓷獸面雙環瓶應確實為景德鎮地區的窯場所燒造，至於是否皆出自湖田窯則尚無法斷定。另外，若這類獸面雙環瓶均為景德鎮窯場所產燒，那麼，在吉州窯窯址中出現有該類風格之作品，以及在這類作品中出現有吉州窯



圖27 元 吉州窯 白地鐵繪唐草紋雙耳瓶 取自相藤茂樹、三上次男編集，《世界陶磁全集13·遼·金·元》，頁125。



圖28 元 米黃釉剔花月梅紋荷葉蓋罐 江西省樟樹市出土 樟樹市博物館藏 口徑6，高6.5公分 取自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吉州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頁114。



圖29 元 米黃釉剔花月梅紋瓶 江西省新建縣昌邑公社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 口徑5，高13公分 取自《中國吉州窯》，頁115。



圖30 南宋 黑釉剔花折枝梅紋長頸瓶 江西省吉安縣永和窯址出土 江西省博物館藏 足徑6.6，高21.2公分 取自《中國吉州窯》，頁66。



圖32 元 白地彩繪鼎式爐 江西省吉州窯茅庵嶺窯址出土 取自張文江、何江、溫葵珍，《吉州窯茅庵嶺窯址考古的主要收穫》，頁88。



圖31 元 米黃釉開片洗口瓶 江西省永新窯藏出土 取自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陶瓷全集·10·元（上）》，圖177。

常見的剔花裝飾工藝的現象，或許反映出兩窯場曾在造形與裝飾技法上相互借鑑的過程，同時也呼應陸明華所認為，在許多窯場發現不是本地燒造的殘破器物，可以理解為有人用以參考或從外地隨意帶來的可能性。¹⁶

小結

透過與目前出土材料之器形分析與胎釉特徵的比對，重新檢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過去曾被視為定窯與宿州窯的白瓷獸面雙環瓶，推斷其產地來源應為景德鎮地區窯場，時代或可置



圖33 青白釉爐足標本 取自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民窯博物館編著，《景德鎮湖田窯址——1988-1999年考古發掘報告》，彩版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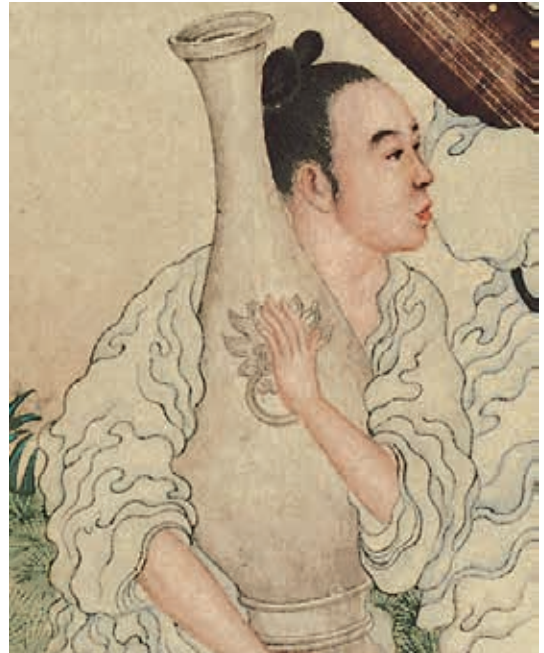
圖34 米黃釉標本 景德鎮浮梁縣縣街周邊出土 取自周浩、曹建文，《新安沉船出水的米黃釉瓷器研究》，頁204。



圖35 清 郎世寧 弘曆觀書圖 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劉瑾、金濤，《中國人物畫全集（下）》，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頁150。



圖36 金至元 白瓷劃花蓮瓣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17725



〈弘曆觀書圖〉局部

於元代晚期。此外，檢查清宮檔案可發現當中出現有「土定窯獸面雙環瓶」的記載，¹⁷ 指的很可能就是元代景德鎮地區燒造的這類所謂仿定窯的作品。並且，在北京故宮收藏的郎世寧〈弘曆觀畫圖〉軸中（圖 35），亦繪製有類似造形作品的圖像，除了可間接窺知這類獸面雙環瓶在清宮的收藏脈絡，也透露出在乾隆年間，或許曾因被當作質地較為粗糙的定窯而收藏於清宮之中的識別過程。¹⁸ 除此之外，故宮博物院也

藏有其他與定窯造形風格相似的米黃開片釉作品，如院藏金至元〈白瓷劃花蓮瓣紋碗〉（圖 36），其胎釉特徵與院藏米黃釉獸面雙環瓶（見圖 1、2、4）皆十分相似，是否是在仿燒定窯的過程中，無意間產燒出了這種釉色米黃並帶有細紋開片，同時不具普遍性風格的產品？這類米黃開片釉產品的出現與性質，或許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思考。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研究助理

註釋：

1.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五編》（北平：清室善後委員會，1925-1926），冊 1，卷 3，〈壽安宮〉。
2.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輯，《故宮瓷器錄·第一輯·宋元（上編）》（臺中：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1961），頁 314；《故宮瓷器錄·清 12 簡目·宋、明》，未刊稿，頁 5。
3. 筆者於器物處庫房工作時有幸能親眼見到實物，觀察該件作品口沿處應為截斷後經過消磨，並且有金屬鉗黏著劑痕跡，然現今金屬鉗已無存。
4. 故宮博物院編，《定瓷雅集——故宮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窯瓷器薈萃》（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 306。
5. 森達也，〈汝窯與南宋官窯——燒造技術和器種的比較〉，《故宮博物院八十五華誕宋代官窯及官窯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 171-185。
6. 森達也著，王淑津譯，〈宋代定窯白瓷的歷史定位——與汝窯、南宋官窯之比較視點〉，《故宮文物月刊》，369 期（2013.12），頁 27。
7. 陸明華，〈韓國新安沉船米黃開片釉瓷產地再探——相關產品的延伸研究〉，《故宮文物月刊》，431 期（2019.2），頁 110。
8. 考古報告根據遺址所見建築遺跡細部情況分析應為元代中期以後所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元大都考古隊、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元大都考古隊，〈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遺址〉，《考古》，1972 年 6 期，頁 11。
9. 在陸明華的文章中已提出上海博物館所藏的〈白釉洗口鋪首瓶〉之造形與景德鎮永樂官窯出土器物風格相差較大，其燒造年代或可能早於明代的說法。陸明華，〈韓國新安沉船米黃開片釉瓷產地再探——相關產品的延伸研究〉，頁 105、106。
10. (清)藍浦、鄭廷桂著，《景德鎮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翼經堂刻同治補修本影印），卷 7，頁 396。
11. (明)曹昭著，舒敏編，王佐增，《新增格古要論》（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天順三年黃正位重校刊本），卷 7，頁 14。
12. 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陶瓷全集·10·元（上）》（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頁 177、178。
13. 陸明華，〈韓國新安沉船米黃開片釉瓷產地再探——相關產品的延伸研究〉，頁 98-111。
14. 承蒙謝明良教授分享展覽相關資訊。展覽資訊取自《唐英學社》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705/22/35985280_922481632.s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7 月 30 日）。
15. 周浩、曹建文，〈新安沉船出水的米黃釉瓷器研究〉，《南方文物》，2019 年 1 期，頁 203、204。
16. 陸明華，〈韓國新安沉船米黃開片釉瓷產地再探——相關產品的延伸研究〉，頁 103。
1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 10，乾隆六年（1741）十一月初七〈廣木作〉，頁 252。
18. 按照乾隆皇帝《御製詩集》卷八十六〈詠定窯碗〉中「今時所見定窯皆白色，上者謂之粉定，次者謂之土定」的定義來看，「土定」即是指定窯中質地較為粗糙的一類製品。孫悅，〈乾隆對定窯瓷器的認識與鑑賞〉，《故宮博物院八十七華誕定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 472、473。

參考書目：

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民窯博物館編著，《景德鎮湖田窯址——1988-1999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